

## “歹”字演变探微

徐时仪

“歹”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并沿用至今的一个口语词,李思纯先生《说歹》一文认为:“汉语谓不良为‘恶’为‘劣’为‘坏’,无所谓‘歹’,现代汉语中,谓恶人为歹人,恶事为歹事,善恶为好歹,已为习见的成语,这在南宋末期以前,是没有的。”认为北宋时“还没有以歹来代替恶劣的意义”。徐复先生《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》一文认为“歹字制作之年代,至迟不出公元 1260 年,早当在成吉思汗后王时,此可断言者也。”<sup>①</sup>刘坚先生亦认为“好歹”肯定不会出现于宋代。<sup>②</sup>然就笔者管见所及的文献资料,唐末五代时“歹”已被用来表达“恶劣、坏”的意思。如《敦煌变文集·父母恩重经讲经文》:“释迦尊,留教勅,看取经文须审的;若是长行五逆歹人,这身万计应难觅。”<sup>③</sup>蒋冀骋先生《近代汉语词汇研究》指出此文文末有天成二年某某书题记,当是后唐明宗时所抄,但认为“歹”出于蒙古语,此“歹”字可疑。今考原卷,此字实作“𠂔”,应是“之”字音误。“歹”字进入汉语,应是蒙古入主中原以后的事情。”<sup>④</sup>蒋冀骋先生认为此例中的“歹”是误字,然而变文中尚有其他用例,如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:“啼树晚莺同助哭,语落秋燕共添哀,分襟顷刻又惆怅,待礼牟尼对宝台。且希居士好调和,不得因循纵病歹,暮被命终难脱免,息然身教大娄罗。”<sup>⑤</sup>核考原卷,“歹”字不误,可证敦煌变文中确已出现“歹”字,两例中“歹”皆为“恶劣、不好”义。

南宋时,“歹”字亦写作“𠂔”,彭大雅和徐霆所撰《黑鞑事略》云鞑人“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𠂔”原注云:“𠂔者,不好之谓。”又云:“见其物则欲,谓之撒花,予之则曰捺杀因,鞑语好也;不予则曰冒乌,鞑语不好也。”冒乌,亦作卯温、卯兀等,是蒙语 magu 的音译,意为“坏,不好的”,<sup>⑥</sup>汉语辞书多释作“歹”,如《华夷译语·通用门》歹作“卯温”,《卢龙塞略》卷十九《译部·译上·通用门》亦云“歹曰卯温”。《元朝秘史》中卯温、卯危等也都作歹。汉语中的歹字用来释蒙语中表示“坏、不好”义的卯温、卯兀、冒乌等,这事实颇值得注意,故方龄贵先生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》认为“倘说‘歹’是蒙古语,那么元明字书(包括《元朝秘史》)中何以用蒙语(‘歹’)训蒙语

① 李思纯和徐复二先生,文载《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》,江苏古籍 1990 版 12—29 页,下同。

② 见《近代汉语读本》,上海教育 1985 年版 157 页。

③ 见《人民文学》1957 年版 693 页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歹人”条引用此例。

④ 见《湖南教育》1991 版 30 页。

⑤ 《汉语大词典》歹字下第二义释为“不健康”,引用此例。《敦煌变文集》“纵”作“拟”,据《敦煌宝藏》所录原卷改。

⑥ 见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《蒙汉辞典》,809 页。

(‘卯兀’及其他类似写法),殊不可解。”<sup>①</sup>

敦煌变文中的讲经文是唐代寺院和民间流行的一种俗讲的底本,保存了大量当时当地的口语资料。宋景祐二年(1035年),敦煌莫高窟寺庙里的僧众为躲避西夏的进犯而远走他乡,逃难之前把一些佛经经卷、俗讲底本和文书等封藏在一个洞室内,后来这些僧众未能再返回敦煌,这批文献也就无人知晓,直至1900年这个洞室才被偶然发现。洞中所藏文献大都是写本,年代约自四世纪末至十世纪末。现存讲经文一类的文献,有的卷末署有年号,多数署五代的年号,亦有少数署北宋初年的年号。根据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洞中所藏写本卷末的最晚纪年,大致可以认为这些讲经文是晚唐五代的作品。<sup>②</sup>因此,我们可以说“歹”字远在宋景祐二年(1035)以前已出现在当时的口语中。

“歹”字虽然在唐末五代的文献典籍中用来表示“恶劣、不好”的意思,然而这个词在宋代的确很少使用,以至直到宋末使用这个词时尚需注明其义。如文天祥《指南录》卷三《上江难》诗序:“至七里江,忽有巡者,喝云是何船,哨答以河鲀船,巡者大呼云歹船。”文天祥特为注明云:“歹船者,北以是名反侧奸细之称。”故清人翟灏《通俗编》卷十一《品目》称“此字宋以前未见用过,惟《元典章》有‘管匠造作,或好或歹,’及‘送纳鹰鹞如歹,徒教耗费支应’等语。”歹字在汉语中的使用与当时我国北方汉族与蒙、藏等少数民族的交往群处有关。人类的语言具有流动性,除了“老死不相往来”的人,人们在相互交往中都不免会产生语言的相互影响。汉代与西域交往频繁,一些西域词汇进入了汉语词汇。南北朝时期,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战乱,中国的主要部分一度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下,这些地方的口语把汉语与北方少数民族语交融在一起,形成了一种当时在各民族间用来交际的“汉儿言语”。<sup>③</sup>据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云:“易服而与之谈,南方士庶数言可辨;隔垣而听其语,北方朝野终日难分。”由此可推知在北方,作为统治者的北方民族使用的是当地的“汉儿言语”,因此士大夫也与平民百姓一样说话用“汉儿言语”,不似南方士庶之间有文白之分。唐代与吐蕃、回纥等交往颇多,语言上也互有影响。宋代是与辽、金、元并峙的时代,汉语受到外来民族语言的影响当然更为显著。随着蒙古族的入主中原,北方各民族间用来交际的“汉儿言语”也就渐渐发展成为在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“普通话”。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文化既低,又无文字,在执政方面确实感到许多困难,于是他们不能不制作他们本族的文字。据《元史·释老传》载:“世祖中统元年,命制新字仅千余,其母凡四十有一,其相关纽而成字者,则有韵关之法,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,则有韵语之法,而大要以谐声为宗。字成,颁行天下。又於州县各设蒙古字学教授以教习之,故当时颇有知其义者。”辽、金、元这三个北方民族统治掌握了中国的政权,他们的语言不免会在汉语中留下痕迹,歹字的形音义的形成与这些北方民族语言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徐复先生已指出“歹字形出于藏文,而语根由于蒙古”,盖歹字源出于北方少数民族语,<sup>④</sup>最初是作为唐末五代的“汉儿言语”而在北方汉语口语中使用的。

唐代寺院和民间流行的俗讲以说唱的形式向听众讲唱佛经故事、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,采

① 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版249页。

② 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尚无定论,学术界一般认为封闭于北宋初年。

③ 参见太田辰夫《汉语史通考》,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201页。

④ 由于“歹”在最初只是个口语词,有音有义但没有相应的字来表达,故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来论定其源于何种民族语言,但至少可以断言其是汉语和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产物。

用听众易懂的口语,作为俗讲底本的变文则记录了这些口语。歹字在当时还仅是一个用来表示“恶劣、不好”义的记音符号,据《字汇》云:“歹,多改切,好之反也。”《字学订讹》云:“歹,俗误作歹。歹,牙葛切,残骨也,与歹不同。”《俗书正误》云:“歹音遏,曷韵。”又“歹,朵海切,戴上声,贿韵。”徐复先生已考定歹字形体出于藏文第三组第一字歹,音如德矮切,指出“今体作歹者,又笔势之变也。”据《敦煌宝藏》所录斯四五七一号卷子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,歹已写作歹。考《说文》云:“歹,剝骨之残也。”《钜宋广韵》云:“凡从歹者今亦歹。”又云:“恶,不善也。”盖歹在宋代已作歹,歹亦与歹字形相近,而恶与歹义同,都有“恶劣、不好”义。《广韵》恶为乌各切,入声,铎韵;歹为五割切,入声,曷韵。恶、歹两字音近,故歹借歹的字形来表达与歹同音的“恶”的“恶劣、不好”义,歹的字音则未变。因此,歹字在宋代已一字兼歹、歹两个词,字形虽同而音义有别。

宋代讲说历史故事的艺人似亦使用“歹”这个词,今尚存的《景宋残本五代史评话》中有用例,如:

黄巢听得恁地说,不觉泪眼汪汪道:“叔叔好交您知,咱也是曹州人氏,只因赴选长安,流落外里,而今盘缠阙乏,无因得回乡故,撞着朱家三个弟弟,邀小人今夜做些歹生活。且借盛庄歇泊少时,求些饭吃,待晚便去。”(《梁史平话》)

(张归娘)跪谢黄巢道:“妾丈夫朱三,是大齐皇帝的弟弟,大齐皇帝便是妾的伯伯。皇帝新得天下,未有休兵之期,岂宜行这无道歹的勾当?”(同上)

石郎若有歹心,必结契丹为援。(《唐史平话》)

朝廷料有歹意,唐主日夕以为忧。(同上)

清(三清)谓其众曰:“上将避兵坐观咱每胜败。咱困急已甚,更无一人救援,想有歹心。咱每但当以死报国耳。”(《晋史平话》)

考《梦梁录》卷二十《小说讲经史》云:“讲史书者,谓讲说《通鉴》、汉、唐历代书史文传,兴废争战之事,有戴书生、周进士、张小娘子、宋小娘子、邱机山、徐宣教;又有王六大夫,元系御前供话,为幕士请给讲,诸史俱通,于咸淳年间,敷演《复华篇》及中兴名将传,听者纷纷,盖讲得字真不俗,记问渊源甚广耳。”<sup>①</sup>现存的《五代史平话》残本是当时讲说历史故事的艺人留下的底本,虽然这个底本很可能已经过元人的增益修订,然而按照常理,口语中一个词的出现到进入书面语大多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,因此,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早在元代以前,“歹”这个词已在汉语口语中使用。

总括上文,可以认为“汉儿言语”中表示“恶劣、不好”义的歹源出于北方少数民族语,唐末五代时在北方汉语口语中使用,宋代传入南方,渐由口语进入书面语,至元代则被普遍使用,成为汉语中沿用至今的常用词。

<sup>①</sup> 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181页。